谈今

全民追剧 有啥秘籍

□ 牛 瑾

剧情与表达方式上与现实高度契合，使其成为一部良心剧。良心剧不需要花哨的营销，一样能俘获观众的心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全民追剧的盛况了，上一次似乎还是爸妈口中的《渴望》。而这一次的追逐目标，则是眼下正在热播的《人民的名义》。它一下子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就连平时基本不看国产剧、又热衷追逐“小花”“小鲜肉”的“90后”们也纷纷加入讨论的行列，成了这部剧的“迷弟”“迷妹”。

很奇怪，是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国产正剧，一般都是资本不愿意投、观众不喜欢看、电视台出价低、连广告植入都少得可怜的待遇，有些甚至七八年都找不到平台播出。如今来了个大翻身，其背后的秘籍的确值得说道说道。

那么，《人民的名义》拍得让从“50后”到“90后”都感兴趣的秘籍是啥？其实很简单，就是照进现实。因为在剧情与表达方式上与现实高度契合，使其成为一部良心剧。而良心剧不需要花哨的营销，一样能俘获观众的心。

在很多普通人眼里，反腐本身就是一场大戏；对反腐相关信息的关切，正是人们对公共利益尤其是切身利益被腐败现象所伤的真实反映。随着现实中反腐的不断深入，公众在拍手叫好的同时，已不满足于简讯式的案情通报，而是希望了解反腐如何反，以便更好地参与和有效地监督。《人民的名义》就以此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故事性的全方位展现，将观众从虚无缥缈的玄幻剧、仙侠剧拉回到现实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似乎都能从这部电视剧中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就像一位网友在留言中说的那样，“汇报紧急任务前先拍马屁的大段前戏，敬酒桌上的人情百态，气急败坏训斥下属的高高姿态，非常真实”。

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剧情照进现实的层面，还不足以把年轻观众吸引到屏幕前来。毕竟，反腐是电视剧领域一直都有的题材，之前却并未引发全民追剧的盛况。这说明，《人民的名义》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和更加贴近现实的表达方式起了关键作用。

《人民的名义》的导演李路曾经说过：“没有人天生是贪官，人都有两面性和复杂性。什么样的欲望、契机、事件促使他们走向深渊，这是我想去探讨的。”因为有了如此的认知，该剧摒弃了呆板的说教，人物形象也一改过去的满脸严肃、不接地气，变得有血有肉、非脸谱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首集中出现的赵德汉。他住着筒子楼、吃着炸酱面、骑着自行车，每月只给乡下的老母亲汇300元生活费；貌似清廉的他，却有另一处隐蔽豪宅，里面藏着的现金塞满了墙柜、床板和冰箱。或许，正是开篇即推出了如此真实的、站得住脚的人物形象，才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一集一集地追下去。

此外，该剧中还加入了“网络直播”“微信点赞”“水军经济”等潮流热点，把生活中每天都能接触到的网络素材嵌入剧中，想必也是让年轻人“走心”的原因之一。而“走心”之后，他们也延伸出了自己的解读。比如，达康书记的各种段子和表情包；比如，“沙李CP”（沙瑞金、李达康）、“海猴子CP”（陈海、侯亮平）等各种CP组合。这并没有消解该剧的严肃性，反倒实现了移动互联时代的二次传播，是件好事。

总之，《人民的名义》就这样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来水”。听说，由原班投资团队投入的“月光下的反腐网剧”——《天上人间》目前正在紧张的剧本创作过程中，预计年底前上网，希望到时又有一部良心剧可以追。

冷眼

直播不是“保险柜”

□ 余 颖

直播厨房不是校园食品安全的“保险柜”，更不能认为装了摄像头就万无一失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校园食品安全这么严肃的话题也经常变成段子。

最近，一位农业大学的学霸因为在菠萝饭里吃到了小昆虫，愤而致信校长投诉：“我还以为是蠼螋，但当我定睛一看，才发现是足丝蚁（它和蚂蚁、白蚁不是一回事）。”他还分析称：“根据那足丝蚁的死相来看，它是因为在蒸菠萝饭的过程中受热后乱爬，然后爬上了饭的表面，最后命陨（殒）蒸屉。”“那么问题来了，食堂给我吃的菠萝饭所用的菠萝皮难道都不洗一洗？如果一洗，这虫子早就被洗走了。”

这封史上最专业的食堂投诉信迅速被网民发现，并引发了集体对食堂黑暗料理和不明异物的回忆大吐槽，真是看得人“笑哭”。不过，我国目前从幼儿园到大学，至少有近3亿在校学生，他们的饮食安全问题绝对不能一笑了之。

4月初，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做好学校食品安全与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里面提出了一个新政策——鼓励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厨房、配餐间等安装监控摄像装置，实现食品制作实时监控，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自觉接受学生及家长监督。

用全社会的眼睛监管一个食堂，直播厨房肯定有助于规范校园后厨管理。比如，2016年以来，青岛市开展网上直播的近1000家中小学校食堂，未发生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故，其平均抽检合格率达到99.71%，比全市平均数高出3.41个百分点，收效显著。因此，今年青岛决定在全市中小学校食堂实现视频直播100%覆盖。

教育部目前的政策是鼓励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堂开通视频直播。这个要求还低了一点，应该要求从幼儿园到高校的校园食堂必须实现配餐和后厨直播。

技术和资金不是问题。一个网络摄像头，便宜的100多元，贵的500元左右，大多数学校都能够承担。展示平台也是现成的。自2015年以来，教育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开展“阳光校餐”项目试点，要求9500余所试点学校按时上报原料采购、当日菜谱、学生就餐照片等数据和图片资料，任何一个关心营养改善计划的民众都可以登录阳光校餐网查看试点学校营养餐情况。现在只要扩大覆盖学校、增加视频内容，就可以实现对全国校园食堂的有效监管。

但是，直播厨房不是校园食品安全的“保险柜”，更不能认为装了摄像头就万无一失。

首先，许多学校的食堂是第三方承包经营，有逐利冲动。考虑到学生、家长、监管部门可能没有时间一直盯着视频直播看，不排除有人会心存侥幸偷懒取巧，甚至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的链条很长。买的大米是不是重金属超标？买的油是不是地沟油？蔬菜农药残留是不是合乎标准？物流中有没有反复解冻，有被污染的可能？这些问题单靠厨房里的镜头根本监控不到。

因此，要保证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从根本上说，必须要抓紧落实《食品安全法》，严格农药管理制度，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特别是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等等，从源头创造一个放心的食品安全环境。

在实践中，除了严格落实相关责任，加强各环节管控外，有的学校还创造性地实行家长轮岗帮厨制，每天邀请一位家长进食堂后厨监督加帮忙，很受家长欢迎，学校也不增加太多麻烦。有条件的地区，完全可以推广这一做法。

宠辱惊不惊

□ 王 毅

因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和积极评价而兴奋激动；因他们的恶感和负面评价而警醒反思，这也正是一种自省的能力和调整适应

我们有两个形容人之心境的成语：“受宠若惊”和“宠辱不惊”。前者言人得到别人垂青时的极其兴奋，后者显示人的一种自信和从容。它们来自《老子·第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

老子看到，人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中的现实存在，他的精神面貌和自我评价其实并不由他自己来决定和呈现。事实上，这操控在他周围的人手中，尤其是那些对他有直接利害关系者的手中。这样的人看得起你，赏识你，喜欢你，重用你，那么你多半就是“受宠若惊”，兴奋、喜悦和自得都会抑制不住，跃然脸上；相反，如果这样的人对你看不起，轻视疏远，甚至是责骂侮辱，你必定是惶恐不安、情绪低落，感觉抬不起头来。老子将这种瞧不起人称为“下”，“下”在这里是一个动词：蔑视、冷落、抛弃，形象而又深刻地显示了一个人的“受辱”之感。

那么，这种“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宠辱若惊”原因何在呢？老子强调的是一个人自身的原因，也就是“贵大患若身”——“把大患及身看得很重”，担心自身会有大患，很在乎自身是否有患。结合下文，这个意思就更清楚了：“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我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我有这个“身”，等到我不把这个“身”看得很重时，我还有什么患呢？还在乎什么呢？

所以，怎样保持做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怎样保持由这种独立性带来的自信和尊严？老子给出的答案是“无身”。“无身”当然不是指不要这个肉身，而是去掉一切你所在乎的身外之物，去掉一切你所在乎的外界评价。在老子看来，这些东西带给你的是患得患失的折磨与痛苦。

苏轼有一首《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夜饮归来，拄杖江边，看着眼前平静东流的长江，想起自己的宦海风波人生坎坷，东坡忆起了老子的这个教诲，正是未能抛开营营役役，将身外之物视为自身，才有了丧失本真之我的“长恨”啊！

然而，事情还有着同样重要的另外一面。必须承认，人的宠辱之惊有着客观因素，而且客观因素往往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宠辱而惊是人之正常反应。对于周围人对自己的反应和评价，我们不大可能视若无物，没有感应。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因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和积极评价而兴奋激动，因别人对自己的恶感和负面评价而警醒反思，这也正是一种自省的能力和调整适应。

职场

“撞钟”也得有标准

□ 郝旭光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由于住持没有提前公布工作标准造成的

一个小和尚担任撞钟一职，每天定时撞钟，一年下来，每天做这种重复性的低端工作觉得枯燥、无聊之极，心中郁闷无比。有一天，庙里老住持通知他未能胜任撞钟一职，要么改正，要么调离。小和尚十分不服气地问：“我撞的钟难道不响亮、不准时？”老住持说：“你撞的钟虽然很响亮、也很准时，但钟声空泛、疲软，没有震撼力和感召力。这钟声是要唤醒沉迷的众生，因此，撞出的钟声不仅要洪亮，而且要圆润、浑厚、深沉、悠远，要让人回味。”这解释听起来不错，确实，人在其位就要尽其责，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小和尚为什么会这么做。

其实老住持犯了管理上的一个错误：事前没有明确“标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由于住持没有提前公布工作标准造成的，如果小和尚开始撞钟前就已经了解撞钟的重要性和标准，他可能不会因怠工而被撤职。

标准有多重要？所谓标准，就是影响问题解决的重要相关因素，即目标及其实现的约束和限制条件。管理过程中实现目标很重要，制约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自然也很重要。标准为管理者提供了判断员工工作活动、过程好坏的依据，提供了判断正确性、管理有效性的检验和指导的标尺。

同时，工作标准也是员工的行为指南和考核依据。缺乏工作标准，往往导致员工的努力方向与公司整体发展方向不统一，造成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因为缺乏参照物，时间久了员工没有努力方向，导致工作懈怠。

鉴于工作标准在管理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审慎地选择评判标准。标准的制定首先要符合工作特点，有利于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制定的标准一定要合理，要能够执行。标准还应具有判别性，应尽量做到数字化，能与考核联系起来，有可操作性。各个标准之间要相互独立，还需要尽可能地把影响管理目标实现的因素都考虑进去，确保评价内容没有遗漏。

当然，标准的量化需要管理者的专业素质。因为外行或许只能听出钟声的慵懒无力，但行家却能听出钟声是否洪亮圆润、浑厚悠远。

说教

大学需要体育精神

□ 王 晋

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且能影响整个社会

最近，一则清华大学要求2017级新生游泳达到一定标准才能毕业的消息在体育界和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为什么一个体育项目的达标与毕业条件关联就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而高等数学不及格、英语四级不达标不能毕业，这些与学业相关的标准出台实行时却未曾见过？这一话题引发热议的背后更耐人寻味。

现实生活中，中小学重智育课轻体育课是通病。虽然人人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但在巨大的课业压力下，不少学校和家长往往牺牲的是“花朵们”锻炼身体的时间。在不少学校，每逢大型考试，被压缩的往往是体育课时和课间休息时间。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不那么优秀的孩子被视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高校学生体育素质。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不断出台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学校体育，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学校体育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总体上看，学校体育仍是教育事业相对薄弱的环节，对学校体育重要性认识不足、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时间不能保证、体育教师短缺、场地设施缺乏等问题依然突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仍是学生素质的明显短板。

如今，日子越来越好，孩子们的营养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青少年的健康情况却不容乐观，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未来国民素质的严重问题。教育部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45.71%，初中生为74.36%，高中生为83.28%。近年来，这一问题并未解决，还有向低龄发展的倾向。

除了近视高发，我们发现，在课业负担和升学压力“两座大山”的重压下，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严重减少，睡眠质量也在下降，他们的平均臂力、耐力、肺活量等身体素质指标也令人担忧。在一些学校，遇到体育重大考试有的家长甚至托人开病假条以逃避测试。

学校体育工作关乎每个孩子的身心健康、一生幸福。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明确了“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中小学要把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和体质情况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校录取时也要把学生体育情况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中，体育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清华大学是一所有体育传统的高校，“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让我们看到了这所名校的责任感。此次对2017级新生作出游泳要求，延续了清华对学生全面培养的追求。

今天的莘莘学子，明天的国家栋梁。希望有更多学校借鉴清华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真重视、真做事，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说过：“体育是培养人们具有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且能影响整个社会。”

世说

方言的韵致

□ 陈莹莹

以方言为契机，不仅可以碰撞出文化的火花，还能够创造文化作品的意境

一个老乡的母亲从老家绍兴来到北京帮她带孩子，操着一口“绍普”融入邻里。一日，老乡的爱人——一位北方汉子问她：“听妈妈说孩子喜欢跟小区的小鸡鸡和小狗狗玩，养狗的人多，可谁能在楼里养鸡呢？”略一思忖，老乡就明白了，母亲跟女婿说的是绍兴话“小姐姐和小哥哥”。

其实，以方言为契机，不仅可以碰撞出文化的火花，还能够创造文化作品的意境。

为了体现电影的“年代感”，导演程耳选择让演员们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说上海话。演员闫妮为了学好上海话，快把舌头给绕断了。在她看来，上海话带来的腔调感是影片的加分项。

事实上，影视作品通过方言来带入情境早已有之，《白鹿原》里田小娥的陕西话和《唐山大地震》里主角们的唐山话便是如此。在文学作品里，很多作家也选择用方言写作，从老舍到王朔，都用了鲜明的北方方言来增加艺术特色。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也选择用沪语写作。他说，在普通话早已普及三代人的当下，《繁花》的对话和叙事全用沪语，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书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是作者用了上千次的“不响”，即“默不作声”的意思。引子里有一段，是卖螃蟹的小老板陶陶和主人公之一沪生之间的交流：“陶陶掸一掸裤子说，香港朋友送的，做生意，行头要挺，要经常送蟹上门，懂我意思吧，送进房间，吃一杯茶，讲讲人生。沪生不响。”

一位网友评论说：试想若是全书不断出现“沪生没有说话”，“陶陶没有说话”，岂止厌倦，简直忍无可忍。当我们观看影视作品，人物对话的情节绝不可能是谁在说话就给谁镜头，而是在恰当的节点将镜头切到聆听者身上。而通过这些“不响”，金宇澄将影视中人物对话时的声画错位剪辑功能带入小说。

以方言为桥梁，还有助于引发心理的共情。去年圣诞节，一则视频在网上热传。日本东京街头的歌手正演唱日语版《海阔天空》，一位女听众用粤语轻声跟唱。歌手发现她是中国人后，露出笑容突然转为粤语原版继续演唱，在异国与同胞一起唱和的女孩当场泪奔。他乡遇故知的琴弦，拨动了人们对故土的思恋。

其实，最能体现方言韵致的还是诗词。近些年，很多人选择用四川话、闽南语、客家话等充满乡音余韵的方言来朗诵古诗词，有中原的“商洛调”，南方的“粤语调”，有融合昆曲艺术的“常州调”，还有平声长、仄声短的“扬州调”。

离家多年，我的孩子也到了牙牙学语的阶段，我翻出另一名老乡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用最熟悉的方言一字一顿地教他：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